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一

文化翻译论纲

A SE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刘宓庆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文化翻译论纲

IN SEARCH OF TRANSLATION
ETHICS IN CHINA



中 华 翻 译 研 究 丛 书 之 十 一

文化翻译论纲

AN OUTLINED THEORY OF
CULTRANSLATION

刘宓庆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翻译论纲/刘宓庆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之十一)

ISBN 7-5351-2577-8

I. 文… II. 刘…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205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430034·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特 6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1.25 印张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2 版

200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235 千字

印数:3 001-6 000

ISBN 7-5351-2577-8/H·93

定价:27.9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 本书体例说明 ■

一、本书取论纲体式,主要立意于提出理论纲要,阐明作者主要的理论观点,勾绘出基本理论架构,论述上也力求突出重点。

二、因此,本书并未对任何一个论题作全面、翔实的论证;有些作者仍在思考中,属于更深层的问题(如思维方式的民族文化特征、思维方式与表现法问题,等等),也未收入本书,留待后论。

三、对许多作者认为有必要加以解释的问题(包括某些基本概念),本书采取了“以注补释”的方法,以佐阐述,或提供背景资料供读者参考、研究,附于章后。

四、本书中的引文大都取自原著,意在让原作者“自话自说”,并通常引入整个有关语段,以求准确理解原著作者的观点,以免断章取义。引入原文也有助于提高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和理解力。

五、本书适用于中级以上的翻译工作者和大学文科研究生及本科高年级学生。

翻译——文化的多维交融

(代 序)

● 刘靖之

“翻译”在佛经传入中国的时代,可能还算不上是一门学问,只能算是一种行业,译员在有组织有计划地日以继夜地将佛经译为中文,使佛经渗入中国文化,数百年后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成为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点来看,佛经的中译,令中国人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宗教,并在生活里使这种外来宗教融化而成为自己的宗教和哲学。这种过程,是一种文化转变的过程,翻译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到了 19 世纪,中国的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生活方式被英国和欧洲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军舰和大炮打得稀巴烂之后,严复想通过翻译把英国的社会科学、富国强兵的文化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令中国也富强起来,不再受欧美列强的欺侮。这样看来,佛经的翻译与严复的翻译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只不过前者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后的效果仍未好好地予以总结。

严复在《天演论》初刻本“刻讫案津覆斟,乃为发言”的破题

话“译事三难信达雅”，事实上是中国近代译者第一次从文化的层次来要求译文所要达到的水准，虽然他自己并没有严格遵守自己所订出来的标准^[1]。所谓“信达雅”是一种在文化上要达到的标准和效果，而不是纯粹追求技巧上的完美。严复自己的译文并没有达到他所提出的标准，后来的人各显神通，有的自我发挥，堕入了狭隘的、匠工式的陷阱；有的则天马行空，挂羊头卖狗肉，糟蹋了原文；当然有许多人把“信达雅”发扬光大，成为 20 世纪中国翻译界的主流。但严复通过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把英国的一些社会科学观点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介绍到中国来，希望能达到他影响改造中国知识分子의思想和观念的目的。从这一点来看，严复在文化层次上所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对中国 20 世纪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五四时代”的翻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叙述：一是有关社会科学论著的翻译，一是文学作品的翻译。20 世纪初，尤其是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后来更加上斯大林的论著，逐渐介绍给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先进分子，为推动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和理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译本。应当说翻译对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有着重要的贡献。

从“五四”时代开始的文学翻译，迄今更是蓬勃发展着。“五四”时代的文学翻译一开始便掌握在作家学者的手里，除了少数几位外，许多著名作家兼任翻译，而他们的翻译一般都是自己心爱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出来让其他中文读者分享自己喜欢的著作、分享自己选择的一种外国文化，如瞿秋白钟情于俄罗斯文化；丰子恺迷恋于日本文化；林语堂醉心于美国文化；梁实秋竭尽心机来把莎士比亚推荐给中国读者。“五四”时代以来翻译的双向发展，形成中国在 20 世纪里社会科学翻译的政治化、文学作品翻译的创作化，前者跟随政策的变化而消长，后者则伴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演变而丰富发展壮大。

生活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有的较相似,有的则相差十万八千里。如进食,在欧洲一般用刀叉,法国人用刀叉,德国人、北欧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都用刀叉,因为他们在进食时才把肉类蔬菜切碎;而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则用筷子,因为在煮熟前,我们已把食物切碎了。在文字上,中文是象形文字,英文和一些欧洲文字是拼音文字,可以说相距甚远,这就注定了从事外中或中外翻译时,我们必定要研究中外文字之异同,不像英译法、法译德、德译荷等欧洲文字之间的差异。这也是中国翻译学的重要特色之一。要解决中外语文之间的翻译问题,仅仅从文字技巧上来着手是难以解决所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从文化上来处理中外文字上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源于生活上的不同而形成。

现在,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翻译除了文字功夫外,文化背景是极其重要的,翻译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不太熟悉的话,译文就会生硬难读,有时甚至不知所云:

他用耳朵的根底听这音响。那是愤怒的叫唤,是犷野的咆哮。他觉得那送来的热情和血的骚扰,在自己的胸中汹涌了。他在脸上,感到暴风雨的狂暴的乱打。前进着,破坏着,而且以伟大的赫尔鸠拉斯底意志蓦地停顿着。那巨大的精灵,沁进他的身体里去了。似乎吹嘘着他的四体和心灵,使这些忽然张大。他踏着全世界矗立著。他正如山岳一般。愤怒和悲哀的疾风暴雨,搅动了他的心。……怎样的悲哀啊……怎么一回事呵!他强有力地这样地自己觉得……辛苦,愈加辛苦,成为强有力的人,多么好呢……人为了要强有力而含辛茹苦,多么好呢![3]

这段译文是鲁迅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黎明”里的一段描述。让我再看看傅雷的译文,一读之下便立即感觉两者之间的差别,究其原因,一是鲁迅对欧洲音乐一窍不通,

而傅雷则研究过贝多芬的生平与创作,熟知欧洲音乐文化,出来的译文当然深具神韵了:

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止,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吧!永远受苦吧!……噢!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多好!……[4]

由此可见,无论译者的文字修养和功夫多么到家,缺少文化背景是不行的。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英国牛津大学退休教授霍克思(David Hawkes)为了要集中精力把曹雪芹的《红楼梦》译成英文,辞去了牛津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座教授一职,待《红楼梦》一书之英译由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出版之后,顿时成为经典译著,虽然并未能为霍克思带来应有的脑力劳动的回报,但霍氏的译本将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的典范之作,当无疑问。下面的一段是第十三回秦可卿向凤姐托梦,其中有这么几句:

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猻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

霍克思的英译如下:

Our house has now enjoyed nearly a century of dazzling

success. Suppose one day “joy at its height engenders sorrows”. And suppose that, in the words of another proverb, “when the tree falls, the monkeys scatter.” Will not our reputation as one of the great, cultured households of the age then turn into a hollow mockery?

宋淇称赞说：“读起来十分舒适，简直不像翻译，尤其把‘诗书旧族’译为 great, cultured households, ‘虚称’译为 a hollow mockery, 实在异常妥贴。”[5]

上面的两个例子说明了文化对翻译的重要性，事实上缺乏文化元素的译文等于缺乏了灵性的翻译。所谓“文化元素”，其实也包括了译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的修养、理解以及而引致的气质和风格。换句话说来说，译文实际是原文 + 原文文化背景 + 译文 + 译文文化背景 + 原文作者的气质和风格 + 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要令这些元素有机地结合起而形成一个综合体，实非易事，但有人做到了这种综合性的工作，如：傅雷的中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如霍克思的英译《红楼梦》。

1983年9月在香港大学的“香港语文研讨会”上，我以《文学翻译与音乐演奏——翻译者应有诠释原著的权利》为题发表对翻译者的权利的观点[6]。文章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明无论原文作者和读者愿不愿意，译者在翻译时都行使了诠释原文的权利。在行使诠释权利的时候，译者也显示了他的气质和风格，如杜国清的中译《荒原》和叶维廉的中译《荒原》：

杜国清的译文

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
让死寂的土原迸出紫丁香，
掺杂着追忆与欲情，
以春雨撩拨萎顿的根茎。[7]

叶维廉的译文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迸生着
紫丁香从死沉沉的地上，杂混着
记忆和欲望，鼓动着
呆钝的根须，以春天的雨丝。[8]

而 T.S.Eliot 的原文如下:

April is the crul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我的评语是:“很明显,杜译用中文表达了原诗内容和气质,但牺牲了‘形’似,叶译保存了原诗的‘形’,但读起来不像中文。陈祖文认为新诗允许叶译的特殊句法。因此觉得叶译更近原诗的风格和节奏[9]。”[10]

另一个例子是孟子《离娄章句》的英译,原文如下:

孟子曰:爱人^I不亲¹;反其^{II}仁²;治人不治³;反其^{IV}智⁴;礼人^V
不答⁵,反其^{VI}敬⁶。行有不得⁷者,皆反求⁸诸己;其身正⁹,而天下¹⁰
归之。诗云:永言¹¹配命,自求¹²多福。 [11]

在这十二句里,前六句的节奏有规律地重复了三次;第七、第八句的节奏有所变化,而第九、第十两句则是 I、II、III 段节奏型的倒置;第十一、第十二句录自《诗经》。在节奏上,这段话既有变化也有统一,换句话说,平衡中有变化、变化中有平衡。这种节奏,成为《孟子》的特殊风格,不容忽视。

《孟子》英译有两个版本较为著名:一是 James Legge,另一个是刘殿爵。James Legge 的处理手法如下:

Mencius said, “If a man love others, and not responsive
—1a— attachment is shown to him, let him turn inwards and exam-
—3— ine his own benevolence. If he is trying to rule others, and his
—3a— government is unsuccessful, let him turn inwards and exam-
—5— ine his wisdom. If he treats others politely, and they do not
—5a— return his politeness, let him turn inwards and examine his
• 6 •

own feeling of respect. when we do not, by that we do, realise
 what we desire, we must turn inwards and examine ourselves
 in every point. When a man's person is correct, the whole
 kingdom will turn to him with recognition and submission. It
 is said in the *Book of Poetry*,

Be always studious to be in harmony with the
 ordinances of God,
 And you will obtain much happiness. [12]

英译固然把原文的内容和含蓄的哲理都表达了出来,但原文的结构、节奏和简练的特色尽失,正如赵元任所说的:“虽然不能说味如嚼蜡,可总是觉得嘴里嚼着一些大黄油面似的。”[13]

James Legge 把简洁的十句原文扩展至十五句,分析如下:

I : 1 + 1a + 2

II : 3 + 3a + 4

III : 5 + 5a + 6

IV : 7 + 7a + 7b + 8

V : 9 + 10

刘殿爵的译下如下:

Mencius said, “If others do not respond to your love
 with love, look into your own benevolence; if others fail to re-
 spond to your attempts to govern them with order, look into
 your own wisdom; if others do not return your courtesy,
 look into your own respect. In other words, look into your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的译文所表现出来的优点与弱点,深入地予以分析,会发觉文化的因素较之于技巧更重要,因此霍克思之能够把“诗书旧族”译为 great, cultured household 是由于他“吃透”了“诗书旧族”的文化内涵。而 Arthur Waley 之拿不准孟子《离娄章句》的节奏,是因为对这段话的旋律缺乏文化感应。另一个问题是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的杜国清和叶维廉,在处理《荒原》里的四句诗时,也显示了他俩对中国新诗所呈现的文化型态,虽然其中的分别带有个人的气质和风格上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人文化修养的一种表现。

译者在诠释原文时,难免在译文里灌注了自己的文化观,在《文学翻译与音乐演奏》一文里,我把这种诠释过程归纳为原作者+译者的混合的过程,所以应是二元化的。事实上这种混合体也是两种文化的结合体,音乐演奏如此,译文也是如此。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可以把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作为翻译文化的指导原则,如此在 20 世纪里有关翻译理论的笔论便迎刃而解了。

在《重神似不重形似——严复以来的翻译理论》一文里^[15],我对各家各派的理论予以论述,结论是:

自严复以来,我国的翻译理论经过了几个成长期,从“信、达、雅”开始,经过“字译”和“句译”,直译、硬译、死译和意译,然后抵达“神似”和“化境”,这其中有不少争论和误会,但大方向却是正确的。严复、林语堂、赵元任、胡适、傅雷、林以亮、钱钟书等人的翻译观点固然是一脉相承的,瞿秋白又何尝不是如此。鲁迅的翻译的确与众不同,但瞿秋白在许多地方指出了鲁迅翻译的“硬”和“讹”。由此可见,在过去八十年里,我国的翻译理论始终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那就是“重神似不重形似”,以便达到翻译上的“化境”。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上述结论忽然孕育出更深层的意义——假如前文所说的“信、达、雅”应具有文化上的含义,那么我们应该要求译文要达到文化上的信、文化上的达、文化上的雅,而严复、林语堂、赵元任、胡适、傅雷、林以亮、钱钟书等人在翻译上的主张不就是文化翻译论的先驱者吗!

宓庆要我为他的《文化翻译论纲》一书写序,并嘱咐说:“你尽管写你的,不要理会我在《文化翻译论纲》里所写的。”为撰写此书,刘氏远赴爱尔兰,足迹遍岛,深入民间考察爱尔兰文化,可见其治学态度之认真、严谨。

中英和英中译文难免反映了这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和排斥的特色,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和教学尚未有所依据。到目前为止,翻译研究和教学工作不得不采用欧美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是建立在欧美语文互译的经验上,对中英和英中互译工作上所遭遇到的问题难以得到妥善的解答。因此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就有其必要了。刘宓庆的《文化翻译论纲》正是我们需要的论著。

注 释

- [1] 参阅冼玉仪《从〈天演论〉探析严复之翻译》,在香港翻译学会 1990 年 1 月 20 日举行的午餐例会上发表,原文为英文,收入刘靖之主编《翻译新论集——香港翻译学会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年,页 359~366,原文为 *Eligabeth Sinn: "Yan Fu as Translator: A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Tianyanlun."*
- [2] 讨论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的论文为数极多,最新的论述包括沈苏儒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和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论严复的翻译理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编《翻译学报》创刊号 1997 年 12 月，页 36~62。

- [3] 日本中译临川、生田长江合撰，《鲁迅译〈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原莽》第七、第八期“罗曼罗兰专号”，民国十五年，页 275。
- [4] 《傅雷译文集》第七卷“黎明”，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年，页 155~156。为便利法文读者参阅，现将法文原文节录如下：

Il la reconnaissait. Il reconnaissait ces hurlements de colère, ces aboiements enragés, il entendait les battements de ce coeur fercené qui saute dans la poitrine, ce sang tumultueux, il sentait sur sa face ces coups de vent frénétiques, qui cinglent et qui broient, et qui s'arrêtent soudain, brisés par une volonté d'Hercule. Cette âme gigantesque entraînait en lui, distendait ses membres et son âme, et leur donnait des proportions colossales. Il marchait sur le monde. Il était une montagne, des orages soufflaient en lui. Des orages de fureur! Des orages de douleur! ... Ah! quelle douleur! ... Mais cela ne faisait rien! Il se sentait si fort! ... Souffrir! Souffrir encore! ... Ah! que c'est bon d'être fort! Que c'est bon de souffrir, quand on est fort! ... (Romain Rolland; Jean-Christophe, tome I, Albin Michel, 1931, p. 115)

有关上述译文，参阅拙文《〈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有关音乐和音乐的翻译》，《神似与形似——刘靖之论翻译》，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页 311~344。

- [5] 林以亮著《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郭英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年，页 6~7。
- [6] 此文收入拙编《翻译新论集——香港翻译学会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年，页 19~34。
- [7] 《现代文学》第 28 期。
- [8] 《创世纪》第 16 期。
- [9] 陈祖文《英诗中译》，《翻译的艺术》，台湾晨钟出版社，1970 年。
- [10] 同注释[6]，页 23。

- [11] 《孟子》〈离娄章句上〉第四章。
- [12] The Work of Mencius,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ume II,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294 ~ 295.
- [13] 赵元任批评 James Legge 翻译的《诗经》和 Arthur Wally 翻译唐诗时所说的话,参阅赵元任〈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刘靖之主编《翻译论集》,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页48—63。
- [14] Mencius translated by D.C. Lau, Penguin Books, 1970, p. 119.
- [15] 刘靖之《重神似不重形似——严复以来的翻译理论》,刘靖之主编《翻译论集》,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